

刘大年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黄仁国（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刘大年(1915—1999)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是改革开放后传承和创新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五老”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主要代表。理解刘大年史学思想的核心以及该核心所涉及的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认识、对历史研究对象的归纳、对研究私有制时代历史基本方法的把握、对历史研究根本任务的确定,对于新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大年史学思想的核心是历史学如何成为科学,而不是历史学如何为政治服务。这一点,他当面跟我讲过。那是1997年8月底9月初在北京他的寓所,我对他进行为期一周的访谈结束时,他再三强调说,历史类比、历史影射根本不是历史学,也不能把历史学当作解释政治任务的工具。我想,这应该是理解刘大年史学思想的关键所在。苏东剧变后,他曾在《历史要分析——谈〈胡乔木文集〉第二卷阐述的历史方法论》中对“政权的权威”对学术的推进与妨碍的双重作用做了深刻分析,说“外来权威把自己的意志加进到科学里面,世界历史上屡见不鲜”^①,表达了对官方哲学干扰学术研究的批评意见。这当然不是一时之念,1961年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康熙》,即对当时学术界受“左”倾影响而出现的非历史主义思潮进行反击;1963年撰写《李秀成评价问题》(排版后未刊),更是对政治势力干扰学术研究进行抗争。

刘大年认为,要使历史学成为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思想地位。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一切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学说中,惟一真正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学说”。^②“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涵义深刻,至少包括这么一些内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是从社会物质生活矛盾出发,将辩证的逻辑分析与精细的历史分析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既是逻辑的也是实证的,是科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学说、观点,或者在某些方面存在合理性,带有先进性,或者能够讲出一番道理,其中有一直受人瞩目的,但无法对社会历史各个领域统一起来去认识。

刘大年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终结真理,但也没有过时。1999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周年”学术报告会上说:“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存在的产物。说它‘万古长青’,那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看看《共产党宣言》就可以明白。说它早就过时了,那就请看看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③他列举1998年3月《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进行分析,指出:“什么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从《卡尔·马克思的手》我们可以知道,各种不同形式所表现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仍然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根本的现实。只要这个现实是客观存在,而非唇舌文字所能推倒的,反过来,它就是对种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最强有力的反驳。”^④

① 刘大年:《历史要分析——谈〈胡乔木文集〉第二卷阐述的历史方法论》,《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82页。

② 《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③ 《刘大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代前言),第3页。

④ 《刘大年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代前言),第4页。

刘大年在多篇文章中讲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要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整体的核心内容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其本质属性、精神实质。将马克思主义随意扩充,什么都往里面装,必将泯灭其本质属性,实际上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将马克思主义任意割裂,抽取个别言论或观点(哪怕是某些重要的观点)抱残守缺,把自己变成“古之人!古之人!”那是教条主义,其结果必然是贬低马克思主义,削弱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至于近年来出现的将马克思主义与辩证逻辑划等号,甚至将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体系视为教条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和妖魔化,其实质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刘大年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以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为出发点,找到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历史运动的物质存在和物质基础;指出了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几个领域是不可分割的,并指出了它们各自的作用和相互关系;将社会生活中多种多样的活动系统化,归结为完全可以从物质上量化查考的社会经济结构系统;主张通过客观事物的重复性来认识历史运动规律。^① 由于刘大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善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他50多年的史学研究中,在主要观点上,保持了非常高的连续性,体现了学术上高度的严谨性;同时,他还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保持学术研究源源不断的创新性。可以说,历次政治运动以及各种社会思潮、史学理论的更迭,影响到其学术研究的,主要是其“形”而非其“质”。以“文革”“搁笔十年”为界,他的前17年和后23年的史学成果之间没有“休克”和“断裂”,只有“抛弃谬误”和“拥抱真理”。这是一种很高的学术境界,是一种在史学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主义、保持独立思考和努力求真求实的上乘境界。这就是几十年后,很多人阅读他的论著时仍会被其蓬勃的生命力所震撼的根本原因。

刘大年认为,要使历史学成为科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分析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一方面,对历史研究的对象为何物,各家各派学说纷呈;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没有构建一个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对历史研究的对象并没有做出明确的阐述。1985年,他在《论历史研究的对象》一文中,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综合分析古今中外的史学成果,提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与一定生产力相联系的、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社会联系及其运动、变迁”。^② 这个定义首先涉及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这是当时学术界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刘大年明确指出生产关系是历史研究的中心,认为“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联系,集中表现了人创造历史各种形式、各个方面的关系、联系和运动。抓住它们,才抓住了历史运动的本质”。这个定义的关键词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社会联系”和“运动、变迁”。二三十年后,有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关系与过程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概括”,并详细阐述如何从“关系”与“过程”两个基本元素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③ 该学者是否阅读过《论历史研究的对象》不得而知,但在构建中国品格的学科理论体系方面与刘大年如此高度一致,绝非巧合。刘大年在论述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时并没有明确地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进行诠释,而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如普遍联系、运动发展、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客观体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等,并充分汲取中外史学理论的合理成分进行说明。很明显,他对历史研究对象的定义是在坚

① 《刘大年集》,第26—27页。

② 《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68页。

③ 参见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西方史学理论合理成分自觉地结合起来了。这个定义将历史视为一个整体运动,要求历史研究必须有宏大的视角,突出历史的主线,同时还要充分注意历史空间的延展性(或共时性)、时间的连续性(或历时性)和时空的交融性,换言之,既要有清晰的骨架,也要有丰富的肌肉和流动的血液。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刘大年认为,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就必须按这个要求去做,否则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他对历史研究对象的研究,实际上是在强调这样一个史学思想:历史研究要成为科学,首先必须弄清楚当时的时代潮流,抓住历史的主线,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置于历史的大情境中,否则不仅仅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碎片化”,还很有可能南辕北辙,迷失方向,甚至陷入不可知论、历史无用论;其次,历史研究不能够止于“致广大”,还要“尽精微”,在史料史实方面下功夫,“非常仔细地、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使历史真正鲜活起来;此外,历史研究要摒弃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综罗百代”,传承创新,对前人的成果要分析鉴别,但不要轻易否定其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认识。

刘大年以私有制时代的历史为例,对历史研究的对象进行求证,指出“私有制社会历史特殊的本质、它的运动形式”是“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它们相互关系的消长变迁,和以此为枢纽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客观体系及其运动”。^①与此相联系,他主张,“研究私有制的历史,阶级分析是基本的分析方法”。^②

刘大年所主张的阶级分析方法,就是分析历史上“与一定生产力相联系的、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社会联系及其运动、变迁”。这种研究方法是他基本的研究方法,贯穿在他的重要史学研究工作中。这应该是他的一个鲜明特点。其处女作1949年版《美国侵华简史》即是阶级分析的杰作。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美国社会作简单的阶级分析,而是从“与一定生产力相联系的、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社会联系及其运动、变迁”着眼,在阐述中美双边关系时,充分发掘美国是如何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联系的,特别是与日本的关系如何;在分析具体的中美关系时,没有局限于政治和军事关系,而是充分考察了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可以说,他是把中美关系扩展到更为宽广的网状交叉关系中进行思考。同时,他按照时间顺序把这种网状关系进行纵向梳理,充分揭露美国随着国力的增长如何对华采取步步推进的战略,如何最终彻底失败。这样组织材料,用当时的话来说是“充满了战斗力”,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饱含渗透力,能够真正深入读者的心灵。这本小册子,虽然他自认为“简陋”,也确实存有一定的时代印痕,但总体上立足于学术,彰显了阶级分析方法的学术价值。其中一些重要思想,如美日勾结谋求地区主导优势等观点,60多年过去后,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其他如对于台湾史、抗日战争史、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由于以阶级分析方法为基本研究方法,重视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和普遍联系,他的研究成果明显高于那些以历史人物的主观意志、个性、品格为主要视角,或者单纯从宗教、文化某一角度对历史进行解读的成果。又如其绝笔《评近代经学》,讲中国近代的经学发展演变,实际上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境内境外的儒学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后期,港台及海外兴起的新儒学思潮,在大陆重视孔子研究的学术环境下,对大陆学术界进行“启蒙”、“接引”和“反哺”,使大陆出现形形色色的新儒家,进而催化大陆“崇儒反马”的复古思潮。学术界不断有人提出要靠孔子来救中国,由孔学统一世界,主张在中小学尊孔读经,要求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在1989年东欧剧变和中国也出现了动乱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成

① 《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90页。

② 《刘大年集》,第26—27页。

为备受关注的重大问题。这对于一向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且有着儒学背景的刘大年来说,此时站出来发声很有必要。他年轻时最大的理想就是做一个训诂考证的经学家,但在晚年研究经学时,却没有被经学思想所束缚。他跳出经学,将近代经学与近代社会现实,特别是与近代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不同阶级对儒学的研究,展示近代经学衰落的轨迹,并从历史的角度对现实发出警示。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是中国文化现阶段的重要发展。孔子学说统治成为过去,近代经学结束,是历史朝前演变的必然,是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①可见,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及其相互关系的消长变迁是经学研究的枢纽,但要把这个枢纽展示出来,需要做的工作很细、很艰难,不仅要以经济分析为基础,还要以利益分析为补充,进而对“枢纽”进行唯物的、辩证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17年,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可以说是共性。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反帝反封建这根“红线”基本上被史学界所接受。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主线的看法有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不同看法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刘大年不同意完全以生产力为中心研究中国近代史,仍然坚持生产关系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他在晚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上两个基本问题的看法,认为一方面“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是两件事,不能互相代替”,民族独立“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近代化“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力的问题”;另一方面,“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是各自孤立的。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②同时,他还指出,这两个基本问题都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内容,“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基本上是民族问题”。^③显然,刘大年对中国近代史上两个基本问题的看法是对反帝反封建这根主线的传承与创新。在他的研究面前,前人关于“谈论历史,最无意思,只是看人相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等论说全都显得苍白无力。

任何一门科学,无不以寻求、认识事物的规律性为任务和目的。刘大年主张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通古今之变”,即“从历史古往今来,它的前天、昨天、今天的不断演变,不断发展,来认识它的内在矛盾、因果关系、前进方向与客观规律性”。他说:“它(历史学)最重要的作用是告诉人们从历史古往今来的不断变化中认识历史的矛盾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基本内容。”^④“通古今之变”涉及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或者说科学性与实践性的问题。刘大年认为,“实践性也就是马克思过去讲的革命性”。“要求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的力度、作用和最大意义所在。”^⑤“研究历史必须是实践性和科学性相统一。”“脱离现实,违反历史,只能让人们造成混乱。”“学术研究不是靠热情和主观愿望,而是靠事实和对事实的了解。历史研究一定要强调联系现实,而科学的历史研究要建立在充实的史料根据上,这样才能发挥史料作用,也是联系现实最基本的一种途径。”“讲历史,总要回到现实之中。一个是不能不联系现实,一个是不能勉强联系现实,牵强附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要还历史以真实面目。”^⑥这些认识表明,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使历史学成为科学的关键所在,而把握这个关键点,实现“通古今之变”的基本途径是由增强科学性来增强实践性,因此,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踏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上”,决不能“信

① 《刘大年集》,第429页。

② 《刘大年集》,第7—8页。

③ 刘大年:《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第3页。

④ 刘大年:《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0页。

⑤ 《刘大年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代前言),第2页。

⑥ 引自1997年8月底9月初笔者对刘大年访谈笔录。

手抓来一点什么,就自以为实现了什么突破”。作为治学严谨的史学工作者,“踏实的科学研究”既包括对历史的分析,也包括对现实的研究。他在“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周年”学术报告会发言中强调:“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应当就是全面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加上全面研究现代社会主义,来攀登上一个全新的制高点,回答人们期望得到回答的当代社会生活中一些重要的问题。”^①这种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一旦与严谨的治学紧密结合起来,自然会使作者创作出与那些“知今不知古”、“知古不知今”或者只关注某一狭小范围的学者风格迥异的作品,而如此“通古今之变”的作品也自然会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

深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而不是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是刘大年毕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的深层缘由和动力所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努力使历史学真正成为科学,既能够客观全面地分析历史,又能够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体现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刘大年史学思想的内核。当然,刘大年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他对于历史学如何成为科学的认识,也远不止以上所论。但无论如何,如何汲取前辈智慧,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发展大繁荣,应是我们探析刘大年史学思想的最大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守望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阵地上

——由刘大年的《论历史研究的对象》说开去

张广智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1999年秋日,时值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世人心绪纷繁,展望与回眸相伴,欢乐与惆怅共生,历史学家尤然。

9月2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只见一位老人,用枯瘦的双手,捧着他的发言稿,在台上一板一眼地声言:“我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作用的。”这位老人就是刘大年,此时他已84岁高龄,且重病在身。羸弱不堪的他,仍抱病莅会,以坚定的口吻,发出了世纪末的强音:“对待马克思主义,要摒弃教条主义,不把自己变成‘古之人!古之人!’”,“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应当就是全面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加上全面研究现代社会主义,来攀登上一个全新的制高点,回答人们期望得到回答的当代社会生活中一些重要的问题”。

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出自刘大年提交给大会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他有力地回应与批驳了世纪末盛行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为后学指点迷津,为世纪末的中国学界抹上了一片亮色。

可叹天不假年,三个月后,刘大年与世长辞,距新世纪只有3天。他留给后人的史学遗产丰厚,他的学术贡献璀璨而光耀,像刘大年这样一生服膺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毕生奋斗不已的历史学家,在当代中国史坛并不多见。个人因限于学识,限于自己的学科领域(笔者是从事

^① 《刘大年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代前言),第5页。